

# 中国地方政治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sup>1</sup>

刘明兴 张冬 钱滔 章奇

作者简介：刘明兴，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教授；张冬，美国西北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钱滔，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教授；章奇，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通讯作者及地址：刘明兴，北京大学教育学院 412B 室，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100871，联系电话：（010）62756488，电子邮件：mxliu@ciefr.pku.edu.cn。

---

<sup>1</sup> 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273012）对本项研究的资助。同时，感谢祝猛昌的研究助理工作。

## 中国地方政治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

**摘要：**本文分析了浙江省内部各县市经济政策差异的历史特征及其政治归因。本文认为，浙江不同地区的共产主义革命传统塑造了基层政权中不同的非正式权力结构。解放前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地区，本地干部在基层政权中的影响力较强，但他们与上级政治精英的非正式联系疏远，不仅缺乏晋升的机会，而受到了政治打压。为了长期的政治生存，他们有激励推行保护产权和市场的经济政策，进而使地方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本文利用 1952 年至 1998 年浙江分县数据检验了上述假说。

**关键词：**革命传统 地方政治 权力结构 民营经济

### **Informal Power Structure and Economic Policy of 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Abstract:** In this research, we will argue that the origin of the spatial variations of local economic policy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1950s to 1990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revolutionary legacies prior to 1949, which is embodied by the events forged at the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 The hypothesis is that: The revolutionary history prior to 1949 shaped the informal power structures in Zhejiang, which in turn determined the attitudes of local officials toward the capitalistic development under their administration since 1949 until into the 1990s. To be more specific, if prior to 1949 a particular locality established its own revolutionary base area, and set up its own military forces, local officials were politically powerful but meanwhile they were oppressed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factional ties with higher authorities was weak and their political upward mobility was blocked. As a result, local political elites in these places had more incentives and capabilities than they would have otherwise to protect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oth in the Maoist era and in the reform era. We test our hypothesis by the county-level data of Zhejiang from 1952 to 1998.

**Key Words:** Revolutionary Legacy, Local Politics, Power Structure, Private Economy

## 1. 引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历程就是民营经济成长和壮大的过程。民营经济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规模上的扩张，<sup>2</sup> 而且也经历了产权结构上的不断创新（Tsai, 2006）。针对这些现象，大量的文献从地方政府制订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动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其中，许多文献侧重从财政分权的角度来理解地方政府发展民营经济的激励机制。例如，Qian 和 Xu（1993）强调地方分权是中国民营经济尤其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制度基础；Qian 和 Roland（1998）认为财政分权和由此引发的地方政府辖区间的竞争部分解决了预算软约束问题；Oi（1992；1995）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分析框架，她指出获取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支持集体企业以及私营企业的动因。

在关于民营企业产权结构的演变方面，Li（1994）强调模糊产权在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的有效性；Weitzman 和 Xu（1994）强调乡镇企业产权的模糊性是基于由多阶段博弈所形成的合作文化；Che 和 Qian（1998）则指出在产权保护缺乏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控制能够有效地防止国家的掠夺行为。当然，也有一些与上述观点相左的研究。如，Nee（2000）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动力在于市场转型成功，而并非地方政府致力于发展经济；Peng（2001）强调不是政府的直接监督而是市场的间接监督降低了乡镇企业的委托代理问题。<sup>3</sup>

现实中，民营经济发展的规模、绩效和产权结构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且地区差距在 1978 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现有文献对民营经济的讨论大都以改革开放为研究的起点，而忽视了改革前地方政府对非国有经济的政策演变。Putterman（1997）指出改革后乡镇企业的发展与之前的社队企业发展具有延续性。在改革之初，有能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地区，往往是那些在过去社队企业已较为成功的地区。为什么一些地区在改革前庇护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呢？这与强调市场化作用的观点并不一致，因此对地方政府的微观动机的研究是不可忽视的。地方官员的政治利益与经济效率是存在冲突的，地方官员只有在确保自身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才可能支持民营化的进程（Ramaurti, 1999；Campos 和 Esfahani, 1996；Oi, 2005）。任期有限的官员具有“流寇(roving bandit)”的趋向，从更可能扮演“掠夺之手”的角色，推行汲取资源的政策，而非保护市场的政策（Olsen, 1993）。是什么机制约束了地方官员的“掠夺之手”呢？如果存在这样的机制的话，为什么对地方官员的影响程度会存在显著的区域性差异？既有的研究文献还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些问题。

为了探究上述问题，本文重点分析了建国后，浙江省内部各县市经济政策和民营经济发展差异的历史原因。浙江省是中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对浙江省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地方经济政策制订与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对浙江民营经济的研究文献已经非常丰富，如史晋川等（2004a, 2004b）。这些文献对“浙江模式”、“温州模式”的起源等问题提出了各种解释。<sup>4</sup> 其中，Liu（1992）提出温州的革命传统是理解民营经济起源的关键：一方面，温州本地的游击队在解放前一直相对独立，与高层政治力量相对疏远，但与温州本地的民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解放战争时期温州的地方游击队参与了温州的解放，因此在解放后地方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能够比较有效地控制本地政权。由于与当地群众的密切关系，他们有动力去变通执行上级的政策，通过各种方式庇护本地带有私营性质的经济发展。<sup>5</sup> Kung 和 Lin（2003）的研究也认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地区在 1959 年所发生的饥

<sup>2</sup> 截至 2005 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 GDP 中所占比重为 50%，内资民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60%（黄孟复，2006）。

<sup>3</sup> 更为全面的文献综述可参见，丘海雄、徐建牛（2004）。

<sup>4</sup> 例如，史晋川（2005）认为，浙江省自然禀赋条件差，但又具有一定的商业传统，两个因素使得政府对民间经济活动的态度比较宽容。不过，类似看法尚缺少严格的实证证据。

<sup>5</sup> 大量的研究文献关注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基层治理的影响，特别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考察了国家权力扩张对基层社会的影响。比如，弗里曼等（2002）以华北平原的饶阳县五公村为个

荒中死亡率低于非根据地地区，这是由于存在根据地传统的基层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地方政府的汲取倾向较弱。

Liu (1992) 的分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的视角。然而，Liu 的解释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她假定地方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由于与当地群众密切关系，从而能够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从全国来看，有很多地区在解放前都建立了革命武装，且他们在解放后也在地方政权中占据优势地位（例如，河北）。为什么温州的本地干部能够保护市场，发展民营经济，而其它地区的本地干部却没能这样做？第二，Liu 并没有具体陈述温州的游击队干部在解放后的政治处境，包括与上层精英的政治关系。处于权力边缘的地方干部并不一定对上级政府的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反而可能是过度的迎合，以扭转自身的劣势。或者，只要上级政权的权力足够强大，下级干部是否敢于冒风险而抵制上级的政策意图，是值得怀疑的；第三，变通执行上级的政策并不必然意味着基层干部会推行对本地民众有利的政策，根本问题在于上级的政策是否满足基层干部的利益要求。O'Brien 和 Li (1999) 指出了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有选择地执行上级的政策。其结果很可能是，不执行上级“好”的政策，而执行上级“坏”的政策。因此，我们不能假定制度都是向“好”的方向演化，而忽略了那些“坏”制度的存在，拥有权力的干部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可能会导致无效率的制度(Acemoglu, 2003, 2006)；第四，Liu 并没有在实证上检验她的假说。游击队干部对地方政权的控制能力是否真得取决于解放市县的军事力量？相对于温州来说，宁波、金华等地都是由南下的野战军解放的，但是其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样非常活跃。

本文试图从非正式权力结构的角来理解地方经济政策的制订和民营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问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正式的政治制度安排层面是基本相同的，但是非正式的权力结构层面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所谓非正式的权力结构是指，政治精英之间存在的非正式政治关系，及其对实际政治权力（*de facto political power*）分配所产生的影响。<sup>6</sup>

对于地方干部而言，维持政治生存（*political survival*）是最重要的目标，该目标有时会与保护产权的激励相容，有时则会相互冲突，因为好的政策可能会威胁到政治生存，而坏的政策反而可能会巩固政治生存(Bueno et al.,2003)。<sup>7</sup> 地方干部的行为动机取决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权力结构。在集权化的政治制度中，下级官员的任免权是由上级官员所掌握（而不是基层干部或者群众），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地方干部更应该倾向于迎合上级的需要，而不是保护基层干部或者群众的利益。那么，是何种政治机制会导致地方干部向自己的下级官员或者群众分配利益？结合浙江的历史，本文的分析逻辑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在权力分配的过程中，政治精英之间经常会出现权力冲突。地方干部可以以私下乃至公开的方式鼓动基层干部或群众向上级控告自己的竞争对手。控告的理由可以依据党

---

案，研究了从减租减息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革命对于农村社会和基层政权的影响，以及国家政权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此相类似的文献可以大致分成两类。一部分文献关注解放前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向农村的渗透和发展，黄琨（2006）讨论了在革命初期通过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向农村的渗透过程；王友明（2006）以山东莒南县为个案研究了4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对于农民参与革命的动员作用。另一部分文献关注解放后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对乡村的影响，考察了国家政权对传统社会的经济关系的瓦解，对农村社会的地权关系的改变，也探讨了国家权力下移到乡村，促使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黄宗智，2000；陈益元，2006；卢晖临，2003，2008；黄荣华，2006）。不过，这些研究对革命所造成的地方政权异质性的关注比较少，也没有建立革命传统与当代基层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绩效的逻辑联系。

<sup>6</sup> 关于政治精英之间非正式政治关系的论述，可以参见 Shih (2007)。概括地讲，如果政治权力在精英之间的分配过程完全是制度化的，那么政治体系就会根据某种稳定的、客观的评价指标来进行权力的分配（如某种客观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或者投票数量）。不过，这个理想状态与现实存在多方面的差距：（1）权力分配的原则往往是由少数精英根据自身的利益所制订的，这经常与社会公众的利益相违背；（2）权力分配的过程并不是制度化的（由于缺乏确保权力分配制度化的“制度”，政治精英之间经常会出现权力冲突；（3）精英之间的权力冲突增强了权力分配规则的不确定性，这也使得非正式的政治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sup>7</sup> 注意，这里所指的“政治生存”是一个比政治晋升更为广义的概念。在现实中，一个官员即使已经没有了获取晋升的机会，也要努力保持或者极大化自己的现有权力。

纪国法，也可以基于完全政治化的、路线斗争式的借口（例如，姓“资”姓“社”的问题。当然，这种权力斗争的方式更多地出现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如果一个地方干部在自己的下级官员中缺乏支持者，那么就很容易会被对手抓住“把柄”，而在权力斗争中失败；

第二，由于政治权力冲突的原因，在集权体制下的地方干部需要来自上级和下级同时的支持，才能确保自己的长期政治生存。不过，“权力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保护基层利益的政策”。更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地方干部只愿意向少数处于关键岗位的下级支持者分配利益，而不会去照顾广大群众的利益；<sup>8</sup>

第三，如果地方干部与上级精英有紧密的非正式联系，在上级政权中有权力根基，他们面临政治攻击的可能性、严重性就会下降。因此，他们有比较强的意愿执行上级要求的政策路线，而缺少动力去获取下级的支持，也就更缺乏激励去推行保护民众的政策；

第四，如果地方干部与上级精英的非正式联系疏远，那么他们就可能在权力冲突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特别是，如果地方干部内部存在密切的非正式联系，那么在权力冲突中他们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而不是其中的某个干部）就都有可能遭到整体性的政治打击。因此，他们就有较强的动力奉行维护本地利益的政策。这并不是源于他们与地方民众关系紧密而所做的“善举”，而是因为“巧取豪夺”将会破坏来自群众和基层干部对自身的政治支持，地方政权中的“竞争者”会借此发动削弱他们权力的攻势；

第五，在中国的干部组织制度之内，地方政权中的上级领导如果要大规模地清洗某一类干部是做不到的。他必须借助于来自高层的政治运动，通过大量发动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揭发、批斗的方式才可以实现此目的。反之，如果一个（或一类）干部得到了来自基层的广泛政治支持，那么想要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打倒他（们）就比较困难了。相反，他（们）可以借助群众运动的力量来消解权力冲突的压力；

第六，在上述情况下，为了确保自身的长期政治生存，保护基层利益的行为对于地方干部而言是一种理性选择。当然，地方干部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推行保护产权的经济政策，要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中所提供的“机会空间”。地方干部（特别是相对级别较高的干部）通常不敢公开拒绝执行中央的政策，因为这样会立即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但地方干部会尽量灵活地执行中央的政策。

具体到浙江的经济发展历史，本文的假说是，浙江不同地区的革命传统塑造了不同地区基层政权不同的非正式权力结构。解放前建立游击队武装的地区，本地干部在基层政权影响力大，但他们与控制上级政权的南下干部的非正式联系疏远，且始终面临来自南下干部的政治打压。为了自身的政治生存，他们有激励推行保护群众利益的经济政策，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文革期间，群众运动削弱了南下干部的政治影响力；并且，从 1970 年开始，中央开始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社队企业，这些都为地方干部创造了更大的政策自主空间。80 年代前奠定的保护产权的政策基础推动了民营经济和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 2. 浙江省的革命传统与政权结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利用国共合作的契机，浙江各地区的党组织得到了初步的发展。1927 年，由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党组织遭到了破坏。<sup>9</sup>同年 6 月，浙江省委重新组建。然而，在白色恐怖之中的浙江省委非常不稳定，领导人更迭频繁，难以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有效的领导和控制。<sup>10</sup>为此，中央于 1929 年 4 月取消浙江省委建制，全省划为杭州、

<sup>8</sup> 正因如此，中国大部分县市的经济增长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虽然 GDP 增长了、财政收入上去了，但是干群矛盾却加剧了。经济增长本身无法做到“藏富于民”，从长期内也就没有可持续性。

<sup>9</sup> 1927 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浙江各级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共产党员的数量由 4 月上旬的 4000 多人减少至 9 月底的 1563 人（参见：《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第 205 页）。

<sup>10</sup> 从省委成立到 1929 年 4 月暂时撤销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省委机屡遭破坏，省委书记、代理书记换了 10 人，其中 8 人牺牲（朱健，2006）。

宁波、温州、台州、湖州、兰溪等6个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但中央对浙江各级党组织的控制力也很有限。<sup>11</sup>

自1929年年底开始，浙南各地区的农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中央派军事干部胡公冕回浙江组织红军，成立了红十三军，主要在温州和台州地区进行武装斗争。1932年，红十三军的斗争宣告失败，浙江的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了低谷。<sup>12</sup> 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闽、浙、赣、皖4省，配合了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而自身却遭受了严重损失。1935年2月，以抗日先遣队突围部队为基础组成的红军挺进师，在刘英和粟裕的率领下，再次进入浙江，创建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开始了三年游击战争。但是，浙江游击区域的地方革命力量与中央的联系有很长时间的中断，而此时全国革命的重心也由南方转移到了北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浙江的党组织从此走向了独立斗争的发展道路。

随着抗日战争爆发，浙江恢复了省委的建制，浙江的党组织曾一度快速发展。但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共产党发起攻势，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在浙江日益加剧。1942年初，浙江省委驻温州的机关遭到了彻底的破坏，刘英等浙江党组织的领导人牺牲，史称“温州事件”。此后，浙南的游击队武装相对独立地开始了抗日武装斗争。与此同时，中央和华中局为了加强对浙江武装力量的领导和整合，建立了浙东抗日根据地。<sup>13</sup> 但是，随着抗战胜利和新四军北撤，浙江地方的党组织与上级组织的联系再一次变得疏远。

解放战争期间，浙江主要的游击队力量集中于浙东地区和浙南地区，浙东游击纵队活跃于宁波、金华及绍兴地区，浙南游击纵队及浙南特委在温州、台州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解放浙江是在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配合下完成的，第二野战军主要解放了浙西南的一些地区，第三野战军主要解放了浙江北部和东部。除了浙西南的衢州地区以及一些岛屿外，浙江解放的过程基本上没有发生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浙江的游击队武装表现活跃，独立解放了24座县城。<sup>14</sup> 随后，野战军随军南下干部进入了解放后浙江省的各级政权中担任领导职务。值得注意的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在浙江解放后向川黔进军，因此解放后浙江的各级政权中的干部来源主要是第三野战军的军事干部和随军南下干部。其中，来自于山东革命根据地的南下干部在解放后浙江各级政权中占据重要地位。<sup>15</sup>

总之，浙江省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历程最主要的特点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由于白色恐怖的影响，浙江省委非常不稳定，无法有效地领导浙江基层党组织，浙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力量开始就处于相对独立状态。而随着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浙江的共产主义运动远离了权力的中心，浙江各地的党组织和游击队武装只能通过独立斗争来维持生存，这也为浙江解放后的基层政权中留下了独特的政治遗产。

如前文所述，野战军随军南下干部和浙江本地干部是影响浙江解放后政权主要的政治力量，省级政权也是如此。一般而言，在省级政权层面，省委会是一个省的最高决策机构。省委会中的常务委员掌握这一个省最为关键的政治权力，他们控制着本省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分配。通过分析历届省委常委的背景资料能够比较好地刻画省级政权的结构。

<sup>11</sup> 参见：《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第22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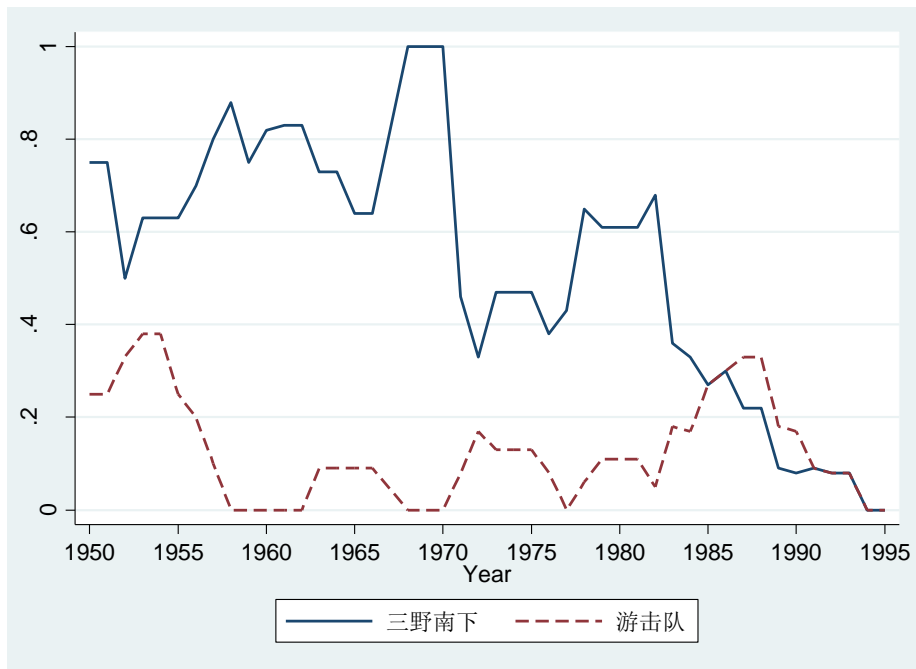
<sup>12</sup> 红十三军共有1700多人牺牲，红十三军的（团）师以上干部和浙南特委的主要领导几乎全部牺牲。（参见：《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第252页）。

<sup>13</sup> 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委成立，谭启龙任书记，负责领导浙东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1943年12月，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为司令员，谭启龙为政治委员。

<sup>14</sup> 浙南特委和浙南游击纵队以谈判的方式与国民党部队达成了和平解放温州的协议，此后相继解放了泰顺、文成、永嘉、瑞安、平阳、乐清、温岭和黄岩等县城；浙东游击纵队的金萧支队解放了杭州地区的部分县城，第二支队解放了诸暨和绍兴两座县城（参见：《浙江解放》，第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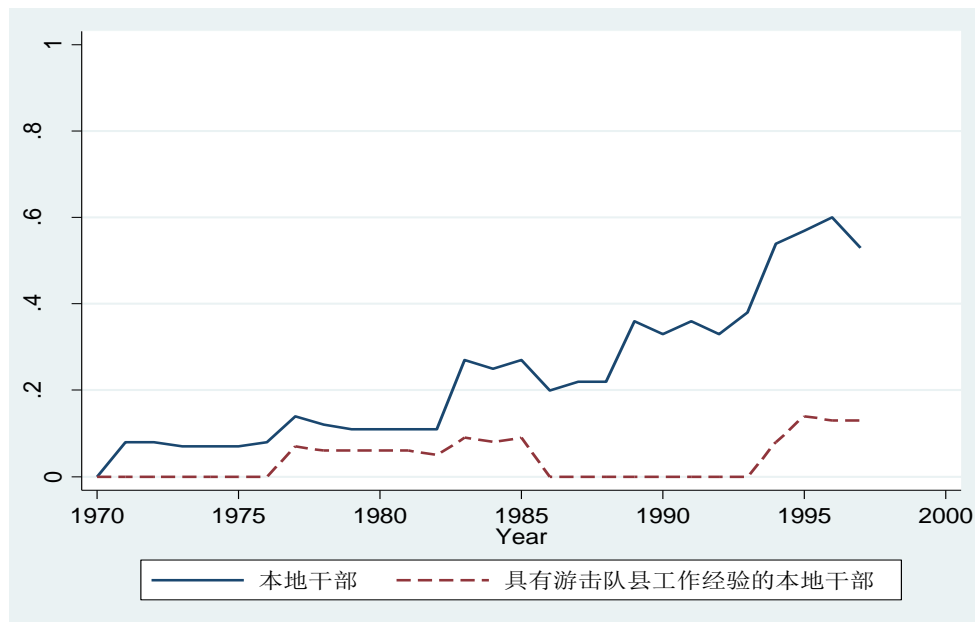
<sup>15</sup> 1948年12月25日，华东局做出了《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因目前华中的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1.5万名南下干部的名额完全由山东来负责。这项指示还就抽调1.5万名干部的任务做了具体分配，其中要求鲁中南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10套地委级、40套县区委级，共调干部3680人；渤海区配备1套区党委级、5套地委级、41套县区委级领导班子的“架子”，共调干部3456人（参见：《山东干部南下》，2005）。

图 1：有革命经历的浙江省省委常委结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所提供浙江省历届省委常委名单以及作者收集的简历资料。

图 2：无革命经历的浙江省省委常委结构变化示意图



资料来源：同上。

在图 1 中，我们重点关注两类在解放前有革命经历的省委常委，一部分是解放前在浙江存在一年以上革命经历的干部（大部分为本省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另外一部分是第三野战军出身的及随军南下干部。如图 1 所示，直到 80 年代中期，在解放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一

直在浙江省省委常委中占据主导性地位。同时，除了解放初期，浙江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在省委常委中均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当然，解放初期的浙江省常委中部分干部虽然在浙江有革命经历，但其中大多数人后来也转入华中革命根据地工作，1949年前后又随野战军南下来到浙江（如谭启龙）。而在浙江本地游击队系统长期工作的省委常委，只有在解放前曾任诸暨县委书记并组建金萧支队的杨思一（时任副省长）。与此相对应，在县市级政权中，外来的南下干部也占据了主导地位。<sup>16</sup>

自70年代开始，一些在解放前没有革命工作经历的干部开始进入浙江省省委会。图2中给出了没有革命工作经历的浙江本地干部在省委常委中的占比变化趋势。这里所谓“本地干部”是指，在担任浙江省常委之前，在浙江有一年以上正处级以下（不包括正处级）工作经历的干部。如图2所示，到90年代中期，没有革命工作经历的本地干部已经占据了省委常委的半数以上。那么这些本地干部是否与解放前游击队武装强大的地区存在某种关系？这里，我们定义在游击队县有工作经历的本地干部为，在游击队县必须有一年以上正处级以下的工作经历（不包括正处级）。<sup>17</sup>实际上，从1970年至1997年，只有三个省常委符合这个条件。

自50年代初期开始，南下干部便与浙江本地的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就出现了权力冲突。例如，浙南游击队在南下干部到来之前就在部分县市组建了各级领导班子，并抵制省委指派的南下干部进入地方党委、政权系统。浙江省委以反对宗派主义、地方主义为名，撤消、调换了部分浙南游击队的主要领导人。<sup>18</sup>在50年代的反右运动中，在各级党委、政府中任职的浙江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进一步受到了打击。例如，杨思一便遭到了迫害，并于1957年去世。<sup>19</sup>

在一些游击队干部影响力薄弱的县（如丽水县），南下干部逐渐控制了地方政权，并从土地改革运动中培养、提拔了大量年轻干部（简称，“土改干部”），取代了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但在游击队力量较强的县（如乐清、慈溪、温岭、金华等县），基层干部队伍中依然以游击队出身的干部为主。本文的研究将表明，由于游击队出身的本地干部在地方政治中处于劣势地位，这迫使他们必须采取保护群众利益的政策路线，并以此获取来自于基层的政治支持。<sup>20</sup>必须指出的是，“土改干部”虽然也都是“本地干部”，但他们的权力基础来自于上级政权，因此更倾向于执行上级的政策方针。此外，“土改干部”之间的非正式政治联系较弱，无法像游击队干部那样采取集体性行动，而任何基层干部都难以独自去改变上级的政策方针。<sup>21</sup>

在50至60年代，由于南下干部保持强势地位，游击队出身的干部多数情况下只能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来减缓左倾经济政策路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正是由于游击队干部对基层利益的保护，维持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他们在文革的群众运动中所受冲击较小，而南

<sup>16</sup> 解放初期，游击队县的主要领导基本上都是本地干部。但在南下干部接管了浙江的各个县政权之后，情况发生了基本性的变化。无论是游击队县，还是非游击队县，县委书记、县长通常都是由南下干部来担任，而本地干部主要是在科级及其以下级别的岗位。尽管如此，在游击队县中，本地干部还是显得要相对强势一些。在1950年-1966年之间，游击队县的县长和副县长级别的干部序列中，本地干部平均占比为32%，而非游击队县为14%。

<sup>17</sup> 这里，我们定义在1948年5月之前（比杭州解放早一年的时间）建立的游击队武装的县为“游击队县”。在本文的计量分析部分，我们也会沿用这个定义，并将做进一步的解释。按照90年代末期的行政区划，浙江省的全部县（及县级市）中一共有38个县符合这个定义。

<sup>18</sup> 例如，1953年，原任温州地委书记的浙南游击队司令员兼政委龙跃被调离岗位，后任上海汽轮机厂党委书记。

<sup>19</sup> 参加 Foster (1997)，第191-232页。

<sup>20</sup> 在具体的政策态度上，也不能武断地以“南下干部”和“游击队干部”作为分界线。在现实中，并非所有的南下干部都支持“左倾”的政策，也不是全部的游击队干部都支持“右倾”的政策。

<sup>21</sup> 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并非所有的“土改干部”都倾向于执行左倾的经济政策，这同样取决于具体的地方政治权力结构。在浙江，许多“土改干部”往往是相对左倾的；但在苏南地区，大量的基层干部都是土改干部，他们同样推行了保护本地利益的政策。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没有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下干部的影响力却受到较大的削弱。从 70 年代开始，在地方政权中南下干部和游击队干部的相对权力结构发生变化。尽管县市政权中的主要领导依然由南下干部来担当，但游击队干部的政治处境有所改善，对于地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也随之增强。

### 3. 浙江地方政府的农业经济政策

#### 3.1 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的包产到户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与中国的其它地区类似，浙江各地区的农村出现了一窝蜂式的生产和分配平均主义的弊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了损害。1956 年春，永嘉县部分公社首先采用了“产量包到社，实行全奖全赔”的生产责任制，<sup>22</sup> 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行为引起了永嘉县的干部的注意和争论。1956 年 5 月，县委决定在燎原社进行队以下产量责任制的试点工作，试行了“三包到队、责任到人、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生产责任制。同年 9 月，县委认定燎原社包产到户的试验是成功的，要求各区乡进行试点工作。至 1957 年 6 月，永嘉县包产到户的社员占总数的 42%，温州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的合作社有 1000 多个，约占入社总农户的 15%。<sup>23</sup>

永嘉的包产到户试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1956 年 11 月 19 日，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指责燎原社搞包产到户。11 月 25 日，永嘉县委写了专题报告《“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回应了《浙南大众报》对包产到户的批评。当永嘉县试行包产到户的消息上报中央后，中央判定包产到户的方向是错误的。1957 年 3 月 8 日，永嘉县委根据省委和地委指示勒令纠正包产到户，除燎原社继续试验外，其它社一律扭转过来。<sup>24</sup> 1957 年下半年，随着全党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开展，永嘉的包产到户在全省遭到了公开批判，并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sup>25</sup> 此后，永嘉县委农业合作部被批为“单干部”，包括县委主要领导在内的一批干部被打为右派。

表面上，永嘉的“包产到户”改革以失败告终。但实际上，永嘉县以及温州地区包产到户的尝试没有得到遏制，此后温州的不少农村特别是山区、半山区的农民仍然是“明统暗分，明统暗包”。这种情况在文革开始以后变得更加明显。1968 年，永嘉坚持包产到户改革的生产队有 5432 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 77.32%，1976 年有 6000 多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 80% 以上。<sup>26</sup>

追溯永嘉县的革命历程，抗日战争时期，永嘉是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纵队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永嘉是浙南游击纵队括苍支队的主要活动区域。我们在永嘉和乐清的实地访谈中发现，大量的游击队出身的基层干部在默许乃至推动包产到户改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且由于他们和农民具有比较强的集体行动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村庄内部相互揭发、指责的问题，这也是“包产到户”政策得以持续的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游击队干部没有激进地执行左倾的农业政策，永嘉县的农村在大跃进期间没有出现过于严重的饥荒，这进一步使游击队干部赢得了来自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广泛政治支持。

#### 3.2 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中的退社

在农业高级合作化的进程中，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退社”和“闹社”的现象（杜润生，2005，P84）。在浙江，许多地区强迫农民入社，采取“抓两头，带中间（依靠贫农、斗争富农、带动中农）的方法，致使不少农民是抱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入社的（薄一波，1991，

<sup>22</sup> 《永嘉县农业志》，第 122 页。

<sup>23</sup> 《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第 21 页。

<sup>24</sup> 《永嘉县志》，第 465 页。

<sup>25</sup> 《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农业社重新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载《人民日报》，1957 年 10 月 13 日。

<sup>26</sup> 《永嘉县志》，第 465—466 页。

P331)”。同时,高级社带来的一系列生产和分配问题极大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因此,浙江许多地区的农民要求“退社”。到1957年夏,浙江省共退出社员20万户,占入社农户的4.3%,有1400个合作社垮台。其中,退社农户比较多的地区是宁波、温州和金华地区,退社户分别占全地区入社农户的11.81%,5.52%和1.85%(叶扬兵,2003)。

宁波地区是浙江省的“退社”闹得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央农村工作部在1956年春的统计显示,宁波已退社的约占社员户数5%,想退社的占20%左右。<sup>27</sup>慈溪县在1957年上半年345个合作社中有3084户社员要求退社,<sup>28</sup>余姚县21个乡镇172个合作社在1957年夏有数万农民闹退社,<sup>29</sup>宁海县在1957年春出现部分社员“闹事”退社现象,农业社散伙51个,半散伙42个;<sup>30</sup>在温州地区,乐清县至1957年2月共散社44个,退社单干4989户,最后不得不对过大的高级社进行调整,<sup>31</sup>瑞安县和平阳县的许多地方也在1957年出现了退社现象;<sup>32</sup>此外,萧山县自1956年秋起,有5000余户社员退社,约占社员总数的4.5%,有114个公社解体,占公社总数的12%。一些乡镇还出现了上千人的示威游行,共计有200多名退社农民到省委上访请愿。<sup>33</sup>

由此可以看出,在农业高级合作化的过程中,浙江省闹退社比较严重的地区恰恰是浙东和浙南游击队的革命老区。<sup>34</sup>当然,我们在实地访谈中发现,游击队出身的基层干部并没有普遍地、主动地怂恿农民闹退社。这些地区之所以会出现较为严重的“闹退社”的现象,是因为许多基层干部在合作化运动中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在同一个县内部,乃至在同一个公社内部,都难以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合作化政策执行的不一致性让农民产生了很强的不公平感,因此容易触发一些群体性的抗争活动。

### 3.3 “农业学大寨”运动

1964年,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78年才停止。在文革期间,大寨经验被有意识地朝强化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方向引导,在农村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工分挂帅、物质刺激”,<sup>35</sup>转而强调“三献一并”,即献自留地、饲料地、自留山和并队升级。这场运动对浙江各地区的影响不尽相同:有的地方搞得很“左”,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在另一些地方,“农业学大寨”运动遭到了各种形式的抵制或是很快得到了纠正,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相对较小。

在温州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当时,温州农村的“分小小队”、“分田到户”之势已经不可遏止。<sup>36</sup>举例来说,乐清县的一些生产队开始搞并队升级,但是“因农民抵制,明合暗分,没有全面推行”,维持了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sup>37</sup>而瑞安县只有少数社队推行“政治评分”和“三献一并”,但遭到抵制,1972年予以纠正。<sup>38</sup>

金华地区的情况与温州相类似,在文革期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体制基本稳定,

<sup>27</sup>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第655页。

<sup>28</sup> 《慈溪县志》,第218页。

<sup>29</sup> 《余姚市志》,第183页。

<sup>30</sup> 《宁海县志》,第180页。

<sup>31</sup> 《乐清县志》,第397页。

<sup>32</sup> 《瑞安市志》第302页;《平阳县志》,第187页。

<sup>33</sup> 萧山县内部文件,1957年7月3日。

<sup>34</sup> 解放前,编入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的游击队在慈溪、余姚和鄞县等地区活动,而浙东游击纵队的铁流支队在宁海县活动,萧山县则是在浙东游击队下属金萧支队的主要活动区域。

<sup>35</sup> “三自一包”指的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四大自由”指的是“种植自由、雇工自由、买卖自由、借贷自由”。

<sup>36</sup> 《温州市志》,第1419页。

<sup>37</sup> 《乐清县志》,第398页。

<sup>38</sup> 《瑞安市志》,第302页。

局部地区搞“政治评分”，收回自留地，但不久即被纠正<sup>39</sup>。例如，浦江县的绝大多数地区都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规模稳定，社队农业有所发展；<sup>40</sup>武义县和义乌县分别在1971年和1972年重分了自留地，恢复评分记工，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纠正了之前“左”的政策；<sup>41</sup>此外，萧山县的干部群众也抵制了“两级核算”等“左”的做法，仍然维持了“三级核算”。<sup>42</sup>

不过，在浙江的另外一些地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政治化倾向则没有得到有效的遏止。湖州地区在文革期间实行了大寨式的政治评分，减少了自留地的比例，推行并队升级，直到1976年12月之后，所并大队才恢复到了原有的规模，社员自留地退回补足，取消了政治评分。<sup>43</sup>其中，德清县和长兴县在文革期间犯了“左”的错误，致使农业发展缓慢。<sup>44</sup>尽管如此，德清县雷甸下高桥大队“把三关”<sup>45</sup>的经验还得到了浙江省革委会的宣传。<sup>46</sup>

与此相类似，衢州地区普遍推行“并队升级”、“穷过渡”，直到70年代后期，大部分公社才恢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sup>47</sup>其中，常山县对“并队升级”的执行最为激进，将2025个生产队并为1001个，333个生产大队全部实行大队核算。此后，常山县虽然在1971年恢复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但至1975年仍然强调突出政治，忽视经济利益，“左”的错误没有被彻底纠正。<sup>48</sup>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无论是三级核算改为两级核算，还是“三献一并”，其实质就是将权力向上集中，藉此从基层汲取更多的资源。但是，在游击队干部影响大的地区，他们没有激励通过集权和激进的手段抽取更多的经济剩余。过分触动基层群众的利益，对于与上级非正式联系疏远的游击队干部而言是不利的；而在解放前游击队力量薄弱的地区（如前述的湖州和衢州地区），与上级非正式关系紧密的南下干部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较强，因此他们有动力集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

#### 4. 浙江地方政府的工业和商贸经济政策

中国的乡镇企业源于农业合作化时期的社队企业。但在大跃进后的经济调整中，社队企业大多被关闭整顿。文革爆发后，城市国营工厂的生产秩序受到了干扰和破坏，大量商品出现短缺，乡镇社队企业借此契机重新起步，满足了生产和生活各方面的需求。1970年8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周总理提出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次年9月，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确立了发展社队企业，实行农村工业化的方针。此后，浙江很多县市的社队企业开始迅速发展。文革期间，全省集体、社办工业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8%。<sup>49</sup>至1978年，在一些乡镇工业发展迅速的县市，社队工业总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以上。更为重要的是，乡镇工业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事实上，改革开放后浙江很多民营企业的前身都是“戴红帽子”的社队企业。

60-70年代，宁波地区的乡镇工业实现了高速增长。其中，鄞县县委在1964年决定恢

<sup>39</sup> 《金华市志》，第370页。

<sup>40</sup> 《浦江县志》，第124页。

<sup>41</sup> 《武义县志》，第179页；《义乌县志》，第103页。

<sup>42</sup> 《萧山县志》，第219页。

<sup>43</sup> 《湖州市志》，第529页。

<sup>44</sup> 《德清县志》，第138页；《长兴县志》，第146页。

<sup>45</sup> “把三关”指的是：一把“种植计划关”，宣扬种粮食是社会主义，种经济作物是资本主义；二把“收益分配关”，批判按劳分配，推行平均主义；三把“产品出售关”，农副产品只准出售给国家或集体商业企业，不准自由贸易。

<sup>46</sup>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第11页。

<sup>47</sup> 《衢州市志》，第455页。

<sup>48</sup> 《常山县志》，第143页。

<sup>49</sup>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第16页。

复和发展社队工业。1966年毛泽东“五七指示”传达后，<sup>50</sup>各社队相继建立农机具修配厂、机电排灌站等工业，全县共有480家社队企业，总产值已经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36%。截至1978年，乡镇工业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60%。<sup>51</sup>

慈溪、余姚和宁海等县的社队工业也在文革时期开始发展。1978年末，慈溪、余姚和宁海社队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51.98%、46.96%和43.15%，<sup>52</sup>而慈溪和余姚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由1966年的80.28%和68.76%下降至1978年的43.96%和29.50%，宁海的全民所有制工业占比由1965年的81.58%下降至39.04%。<sup>53</sup>这反映了地方政府对于资源汲取能力趋于下降，基层拥有了更多的经济剩余来发展工业。

温州地区乡镇工业的发展与宁波相似。文革期间，乐清除少数偏僻的山区外，社队企业普遍兴起并迅速壮大，1978年社队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42.54%，1979年社队企业上缴的税收占全县财政收入的38.5%，全民所有制工业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66年的56.52%下降至1978年的16.78%；<sup>54</sup>平阳县的社队工业在60年代中期开始恢复发展，1978年其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1.07%，这一比重到1988年上升至71.66%；<sup>55</sup>瑞安县的社队企业也在70年代逐步发展，至1977年农村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30.61%，<sup>56</sup>全民所有制工业由1966年的39.52%下降至1977年的20.95%；<sup>57</sup>永嘉县的社队企业在文革初期虽然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予以批判，但是到了70年代初，社队工业就从“三就”方针中摆脱出来并迅速发展。<sup>58</sup>1978年社队工业总产值约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42.54%，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从1966年的56.52%下降至1978年的16.78%。<sup>59</sup>

必须指出的是，同样是游击队县，其内部不同乡村的工业发展速度是极其不平衡的。以乐清平原地区的各乡镇为例，柳市区和虹桥区的乡镇工业在70年代出现了高速发展的势头。而这也恰好是解放前革命力量最为活跃的两个区域。我们在虹桥和柳市的访谈发现，大量游击队出身的乡村干部在70年代带头创建了各种社队企业。其中，许多企业名为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私人所有的股份制企业。在这些企业创办的过程中，在温州各级政府中工作的永乐游击纵队出身的干部（甚至是在浙江省政府中工作的游击队干部）在政治和经济的多个方面均给予了支持。由于企业的发展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实惠，游击队干部的政治基础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sup>60</sup>

与浙东和浙南地区有所不同的是，解放前游击队力量相对薄弱的浙西南和浙北地区的社队企业在70年代的发展相对缓慢。然而，无论是地理条件还是经济基础，浙北地区发展

<sup>50</sup> “五七指示”中有关社队工业发展方面的内容有：“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sup>51</sup> 《鄞县县志》，第619—623页。

<sup>52</sup> 《慈溪县志》，第385页；《余姚市志》，第307页和第311页；《宁海县志》，第350—351页。

<sup>53</sup> 《慈溪县志》，第381—382页；《余姚市志》，第311页；《宁海县志》，第351页。

<sup>54</sup> 《乐清县志》第505—506页和第530—531页。

<sup>55</sup> 《平阳县志》，第277页。

<sup>56</sup> 该数据由《瑞安五十年》提供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此处没有用1978年的数据是因为瑞安县在1978年国有工业在1977年至1978年增长了56%，国有工业的这一异常增长影响了对乡镇工业的分析，为了排除这一影响，我们在此使用了1977年的数据。参见：《瑞安五十年》，第113页。

<sup>57</sup> 《瑞安市志》，第562页。

<sup>58</sup> “三就”方针指的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销售”。

<sup>59</sup> 《永嘉县志》，第560—561页，第566—567页。

<sup>60</sup> 注意，在温州内部的各个乡镇之间，乡镇企业发展的“产权结构”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以乐清为例，柳市区（“区”是90年代之前一个介于县和乡镇之间的行政管理层级）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虹桥区的集体经济而相对较强。究其历史，在虹桥的游击队干部对当地的控制力较强（70年代之后，虹桥区委委员全部由本地游击队出身的干部担任），因此可以控制一些经济资源在基层政府手中；而柳市区的区委书记却长期由外来乡镇的干部担任，本区游击队出身的干部长期担任区级副职及以下级别领导。不过，由于柳市本地的游击队干部持续地保护基层利益，导致70-80年代的外来的区委书记往往很难指挥这些本地干部，最终无法长期立足。这些经验事实说明，地方非正式权力结构的差异是引起乡镇企业产权结构历史差异的重要因素。

工业的自然条件都不比浙东的宁波地区差，更优于浙南地区。在嘉兴地区，嘉善县的社队工业在文革期间时起时落，到1978年，社队工业仅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6.71%；<sup>61</sup>海宁县的社队工业在文革期间发展缓慢，直到70年代后期才开始迅速发展，1978年乡村及村以下工业总产值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26.31%；<sup>62</sup>平湖县的情况也类似，1977年社队工业总产值仅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9.29%。<sup>63</sup>

在湖州地区，1980年的乡镇工业总产值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14.7%。<sup>64</sup>以德清县为例，1978年社队工业仅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23.94%；<sup>65</sup>安吉县的社队工业在1978年工业总产值的占比仅为13.64%，全民所有制工业所占比重没有下降，反而由1965年的70.34%上升至75.24%。<sup>66</sup>

浙西南的衢州地区甚至到了80年代初，仍然“没有确立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以工业为主导的指导思想”。<sup>67</sup>衢县的社队工业在1978年的产值仅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2.26%，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由1966年的75.65%下降至66.62%；<sup>68</sup>常山县的社队工业在1977年后才开始发展，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在1978年为72.8%，而这一比重在1966年为73.0%；<sup>69</sup>龙游县的乡镇工业产值在1978年仅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13.87%，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的比重为72.36%，较1966年的83.61%略有下降；<sup>70</sup>1952年人均工业总产值位于浙江省前10位的开化县，在1978年的社办工业总产值仅有345万元，仅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7.63%，<sup>71</sup>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由1966年的84.95%下降至1978年的79.31%。<sup>72</sup>由于社队企业的活力没有被充分释放，解放初期拥有比较好的工业基础的开化县到了1998年的人均GDP却位列浙江省倒数第12位。<sup>73</sup>

表 1：各县市全民所有制工业比重变化及 1978 年社队工业比重

地区	县市名	1966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比重 (%)	1978 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比重 (%)	1978 年社队工业产值比重 (%)
宁波地区	鄞县	不详	小于 40%	60%
	慈溪县	80.28%	43.96%	51.98%
	余姚县	68.76%	29.50%	46.96%
	宁海县	81.58%	39.04%	43.15%
温州地区	乐清县	40.21%	28.87%	42.00%
	平阳县	不详	估计小于 50%	41.07%
	永嘉县	56.52%	16.78%	42.54%

<sup>61</sup> 《嘉善县志》，第 303 页和第 310—311 页。

<sup>62</sup> 《海宁县志》，第 182—184 页。

<sup>63</sup> 《平湖县志》，第 278 页。

<sup>64</sup> 《湖州市志》，第 576 页。

<sup>65</sup> 《德清县志》，第 254—255 页。

<sup>66</sup> 《安吉县志》，第 195 页。

<sup>67</sup> 《衢州市志》，第 406 页。

<sup>68</sup> 《衢县志》，第 197—198 页，第 207 页。

<sup>69</sup> 《常山县志》，第 232—233 页。

<sup>70</sup> 《龙游县志》，第 235—236 页。

<sup>71</sup> 由于资料的局限，此处不包括村及村以下工业的产值，虽然会对社队工业的比重低估，但是我们认为即使算入这部分产值，该县的乡镇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仍然会比其它地区低很多。

<sup>72</sup> 《开化县志》，第 212—213 页。

<sup>73</sup> 不过，衢州的干部却得到了省委领导的提拔。80 年代，温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往往都是早年从衢州提拔上来的干部。

	瑞安县	39.52%	20.95%	30.61%
嘉兴地区	嘉善县	77.42%	55.10%	16.71%
	海宁县	84.94%	53.41%	26.31%
	平湖县	不详	不详	19.29%
湖州地区	德清县	78.62%	估计大于 50%	23.94%
	安吉县	70.34%	75.24%	13.64%
衢州地区	衢县	75.65%	66.62%	12.26%
	常山县	73.00%	72.80%	不详
	龙游县	83.61%	72.36%	13.87%
	开化县	84.95%	79.31%	7.63%

注：表格中个别县市的数据为 1965 年和 1977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各县县志相关数据整理

与农村工业的迅速发展相伴随，浙江的许多游击队县在 60-70 年代就推行了保护商贸市场的政策，“禁止明的，默许暗的”，这又进一步促进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sup>74</sup>温州地区市场上的无证商贩虽经常被作为“资本主义势力”予以打击，但“未见减少”，1976 年 5 月有 11000 多户无证商贩。<sup>75</sup>永嘉县各乡镇随处可见由群众自发组织形成的市场，永嘉和乐清两县交界处的岭窟市场是浙南最大的“黑市”，参市人数多时一天逾万人，但一直没有被取缔<sup>76</sup>；瑞安县境内多处出现木材“黑市”，<sup>77</sup>并且还存在着菜市场 and 耕畜市场<sup>78</sup>；平阳县的市场“时开时闭”，市场也没有被完全取缔。<sup>79</sup>

然而，衢州地区的地方政府却推行了宁“左”勿“右”的政策，农民到集市出售农副产品被视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坚决取缔了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和运输队。<sup>80</sup>在文革期间，开化县把集市贸易当作“四大自由”之一，严加限制<sup>81</sup>；常山县于 1968 年起关闭了城乡农贸市场，偶有少量茶油等上市也被市场管理部门没收<sup>82</sup>；江山县在 1968 年关闭了粮食市场，少量贩卖活动被视作弃农经商、投机倒把，同时取缔了“地下工厂”、“黑店”等私营工厂和商店。<sup>83</sup>

浙江乡镇工业和民间商贸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从文革期间开始的。这既得益于中央经济政策在 1970 年前后的变化，也是源于文革的政治冲击改变了地方政治中的非正式权力结构。我们的温州的实地访谈发现，相对于南下干部，大量的游击队干部在文革期间能够借助自身的群众基础，利用群众运动来保护自己，并在 70 年之后迅速复出。<sup>84</sup>尽管 70 年代浙江县市

<sup>74</sup> 我们在实地访谈中走访了一些在 70 年代负责集贸市场管理的基层干部。他们表示，虽然自己的工作任务是“打击黑市”，但其实自己的家属就在“黑市”中进行交易。

<sup>75</sup> 《温州市志》，第 2014 页。

<sup>76</sup> 《永嘉县志》，第 656 页。

<sup>77</sup> 《瑞安市志》，第 358 页。

<sup>78</sup> 《浙江省市场志》，第 558 页。

<sup>79</sup> 《浙江省市场志》，第 603 页。

<sup>80</sup> 《衢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志》，第 103 页。

<sup>81</sup> 《开化县志》，第 279 页。

<sup>82</sup> 《常山县志》，第 164 页。

<sup>83</sup> 《江山市志》，第 324 页。

<sup>84</sup> 我们在乐清柳市访谈的一位游击队干部表示，“幸亏我在大跃进的时候帮助农民找粮食吃，所以在文革期间才没有被打倒。”这位老干部在 70 年代也属于发展社队企业的“积极分子”。当然，这并不是因为这位老干部有历史的先见之明，而是因为不按照这个政治逻辑办事的干部，最终在政治运动的风雨中都陆续被淘汰了。其实，在浙江的游击队干部中，也有不少人在政治压力之下彻底倒向了南下干部（在当地被指责为“投降派”）。他们为了讨好上级，积极地执行极左政策路线。但是，在大跃进期间，政策手段激进的部分游击队干部最终也没有得到提拔重用。由于和基层干部、农民的关系紧张，部分干部在四清运动中被

级的主要领导依然由南下干部担任,但是南下干部对游击队干部进行政治打压的能力逐渐减弱,这导致游击队干部可以在更大的政策尺度上保护基层的利益。此外,必须指出的是,游击队干部在群众中的社会基础对自身产生了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不仅仅体现在文革期间。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在四清运动期间,温州的南下干部也试图通过发动农民来揭发、打击基层的游击队干部,但是农民并不配合上级派来的工作组,结果只能不了了之。

不过,如图2所示,在70-90年代,浙江省委常委中本地干部大部分都是从非游击队县以及省直机关或者省属国有企业中提拔起来的。换言之,游击队县的地方干部不仅在文革之前受到了南下干部的压制,在文革之后依然缺乏晋升的机会。因此,游击队干部有动力继续执行保护群众和市场的经济政策,进而推动了这些县市的持续经济增长。

## 5. 实证检验

前文通过案例比较的方法说明了,游击队县和非游击队县在农业、工业、商业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和执行力度上都是有差异的,这影响了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本部分将运用OLS回归来检验前文的假说。统计模型中的主要变量包括,衡量浙江经济增长和民营经济发展的被解释变量,测度解放前游击队武装强弱的解释变量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不过,本部分主要是利用工业增长的统计数据来间接性地检验前文的假说,因为各种地方经济政策在历史上的差异很难构造一致性的测度指标。

### 5.1 模型设定及数据来源

为了从不同角度衡量浙江省各县市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情况,我们选取了浙江省各县市1978—1998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1952—1998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1998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1998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及非外商投资企业工业总产值等4个被解释变量<sup>85</sup>,其中后2个变量在估计中都取了对数。<sup>86</sup>各县市1952年、1978年以及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的数据主要来自于《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52年和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是按1998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根据1949—1998年工业总产值指数平减)。此外,宁波地区各县市的相关数据来自于该地区各县的县志。<sup>87</sup>

根据前文的假说,解放前地方游击队力量的强弱是本文最为关键的解释变量。我们认为,如果一个县在解放战争时期建立了革命地方武装,具有一定规模,那么这个地区解放前游击队力量就比较强;反之,如果一个县在解放战争时期没有建立地方武装,那么该县解放前的革命力量就相对较弱。不过,在杭州解放前一年,随着革命形势逐步好转,国民党军队对各县市的控制能力大大下降,一些县市的游击队武装扩大了活动范围,进入了本来没有建立地方革命武装的县市。为了控制这一影响,我们定义,如果在1948年5月之前(比杭州解放早一年的时间)就建立了游击队武装,那么该县(市)的革命传统和游击队的力量就相

---

农民告倒了,还有部分干部在文革期间遭到了造反派的打击,最终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sup>85</sup> 人均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减去了外商投资经济(包括港澳台投资)的工业产值,就得到了人均非国有经济及非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由于在1998年,浙江省的外商投资(包括港澳台投资)占整个工业总产值的比例相对较低,对整个经济的影响还很有限,因此外商投资的问题不作为我们讨论的重点。

<sup>86</sup> 从90年代末期开始,浙江开始了比较大幅度的区划调整,许多县以及县级市都被合并为市区,这使得我们回归的县市样本数量明显减少。同时在撤县变区的过程中,行政区划边界出现了一些调整,这导致样本在统计上的时间不一致性。为了避免这些问题,我们的回归就截至到了1998年。

<sup>87</sup> 《余姚市志》,第193—194页;《奉化市志》,第254页;《象山县志》,第146—147页;《宁海县志》第351页;《慈溪县志》,第381—382页。其中余姚、奉化、象山、宁海的工业总产值数据直接从县志或市志中获得,慈溪的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和1955年的数据取平均值估算得到,这些县市的工业数据是按198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的,我们按照《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提供的工业产值的价格指数折算成1998年的价格。

对较强；否则，就属于游击队力量较弱的地区。我们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来测度这种差异，如果解放前地方武装力量强，虚拟变量则设为“1”，反之则设为“0”。<sup>88</sup> 我们预期，这一虚拟变量对经济发展有正向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历史关键时点(critical juncture)的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外生的冲击，因此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武装力量的强弱这一变量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外生变量，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回归中的内生性问题。<sup>89</sup>

Liu (1992) 认为，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各县市分别由不同来源的军队解放会对县市本身后期的经济发展产生影响。如前文所述，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是解放后浙江各级政权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那么来自山东根据地的野战军解放的地区在经济增长中的表现如何呢？是否在这些地区南下干部对地方政权的控制力更强？如果一个县是由游击队解放，游击队出身的干部是否能够更积极地执行保护群众的经济政策？为了评估这一效应，我们根据《浙江解放》一书构造了两个虚拟变量，一个变量测度县市是否由来自山东革命根据地的野战军部队解放，即如果该县是由第三野战军中的 22 军、26 军、27 军、28 军、31 军、33 军、35 军解放则设为“1”，否则设为“0”。该变量意在衡量“解放效应”是否会强化南下干部在地方政权中的影响；另一个是测度是否由游击队解放的虚拟变量，即如果该县由游击队解放则设为“1”，否则设为“0”。<sup>90</sup>

如表 2 所示，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武装强弱这一虚拟变量的平均值为 0.63，即 63% 的样本地方武装的力量比较强，在 58 个回归样本县中有 37 个县市在解放战争时期拥有比较有影响力的地方游击队。<sup>91</sup> 解放战争时期地方武装比较强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浙东游击纵队活动的宁波地区和金华地区和浙南游击纵队所在的温州地区，地方武装力量比较弱的地区主要集中于嘉兴地区、湖州地区以及衢州地区。此外，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的样本中有 17 个县市是由游击队武装解放的，占样本总量的 29%，<sup>92</sup> 有 27 个县市是由来自山东根据地的野战部队解放的，占样本总量的 47%。

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两方面：初始的经济指标和地理变量。在初始经济指标方面，我们将控制各县市 1952 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人口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在 1978—1998 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回归中还需要控制 1978 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

关于地理因素，我们主要控制平均海拔、海岸线的长度（内陆县为“0”）、15 度以下平地面积占全县面积的比例，以及到上海的直线距离等。平均海拔的主要用来控制山区和平原的地形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海岸线的长度主要用来控制沿海或内陆的地理位置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15 度以下平地面积比例主要衡量该县市可供开发为工业园区的土地资源比例，到

<sup>88</sup> 相关资料信息来自于《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以及各县县志。

<sup>89</sup> 一个地区是否会产生革命武装力量，要取决于多种因素。例如，在全国范围内战争双方的相对兵力分布及战争的结果。笼统地讲，革命根据地往往都位于一些贫困的山区，但并不是贫困落后的地区就能够建立根据地。当然，对于两个相邻的地区，革命武装能否建立起来也可能会受到许多微观因素的影响。不过，浙南地区在历史上一直属于浙江的不发达地区，因此即使有某种因素会导致其容易产生根据地，但是这些因素一直都没有导致经济增长。因此，这个不可观察的微观因素与经济增长并不直接具有相关关系，革命武装的产生也就外生于经济增长。进而，如果有一个不可观察的微观因素会影响到革命武装的建立，并且这个微观因素有可能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对经济增长则没有作用），那么如何解释全国各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在解放后经济增长绩效的巨大差异？这说明，即便存在这样一个微观因素，它对解放后的经济增长也没有重要影响。

<sup>90</sup> 注意，某县（市）可能由三野解放，也可能由最后进军川黔的二野解放，也可能是由游击队独立解放，同时也可能是野战军在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所以某县除了被游击队解放或者三野某部队解放之外，还有其它情况。

<sup>91</sup> 这里的县及县级市（不含市辖区）是按照 1998 年浙江省的行政区划来确定的。由于个别县市存在数据缺失，因此回归样本中一共包含 58 个县（市）。

<sup>92</sup> 如前文所述，浙江省共有 24 座县城由游击队武装解放，此处只有 18 个样本，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1）有一些县并入了其它县中，如当时的新登县并入了富阳县，分水县并入了桐庐县等；（2）如有一些县并入了城区，如黄岩县在 1994 年改设为台州市的黄岩区，（3）一些县市成为了地级市的市区，如温州市。



上海的距离主要控制该县市的区位优势。这些数据来自作者收集的地理信息数据库，其中到上海的距离是通过该县市和上海两地中心点的经纬度计算得到。

此外，由于研究文献中普遍认为，人力资本水平对长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我们测度了浙江各县市的历史教育传统，作为回归中控制变量。根据朱保炯等（1980），我们对明清两朝中所有籍贯在浙江的进士进行了统计，得到了各县进士的数量总和。在回归中，平均海拔、海岸线长度、进士数量和到上海的距离四个变量都取了对数。

表 2：浙江省相关数据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名	观测值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1978-1998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年均指数增长率 (%)	58	12.18	2.30	8.13	17.08
1952-1998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年均指数增长率 (%)	58	12.09	2.22	5.41	17.96
1998 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	58	19628.17	13961.54	1184.39	48343.86
1998 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及非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	58	18495.25	13062.47	1168.37	45558.35
游击队强度 (1=强, 0=弱)	58	0.63	0.48	0	1
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58	0.29	0.46	0	1
来自山东的野战军解放 (1=是, 0=不是)	58	0.47	0.50	0	1
1952 年人口规模 (万人)	58	28.56	16.15	4.06	79.22
1952 年人均耕地面积 (公顷/万人)	58	982.58	309.87	148.00	1705.00
1952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98 年不变价格)	58	98.70	77.48	15.38	458.22
1978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98 年不变价格)	58	611.61	316.54	49.59	1507.66
明清时代进士数 (人)	58	70.97	108.63	0	640
平均海拔 (米)	58	278.87	209.17	3.00	877.00
平地面积比例 (%)	58	21.90	19.15	0.00	91.67
海岸线长度 (千米)	58	40.25	88.32	0	494.92
到上海距离 (千米)	58	262.03	108.00	51.15	456.75

## 5.2 估计结果及说明

如表 3 所示，在模型 1 中，被解释变量为 1978—1998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年均指数增长率，测度游击队力量强弱的虚拟变量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并对改革后 20 年期间的经济增长率有正向的影响。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游击队力量强的县市在 1978 年至 1998 年之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比其它县市高 2.40%。1978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其它因素的前提下，浙江各县市的经济增长在改革后的 20 年间存在有条件收敛的趋势。也就是说，初始的经济基础对于浙江各县市的在改革后的增长并不重要，属于浙南游击队根据地的县市虽然初始的经济基础并不好，但是在经济长期的发展中实现了向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收敛。

在模型 2 中，被解释变量为 1952—1998 年人均工业总产值年均指数增长率，测量游击队力量强弱的变量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游击队力量强的县市在 1952 年至 1998 年之间的年均指数增长率比其它县市高 1.395%。这表明，游击队力量强的县在 1978 年之前就已经表现出比其它县市更强劲的增长绩效。1952 年的人均工业总产值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负向显著。在模型 3、4 中，对于取对数的 1998 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和人均非国有经济及非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游击队力量强弱的变量均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正向显著。

在控制变量中，初始人口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建国后的工业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历史上的进士数量等变量则没有显著影响。考虑到初始的工业发展水平与长期增长绩效负向相关，而进士数量没有影响，我们可以初步推断，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传统或者商业文化传统是否发达，并不是建国后经济发展绩效高低的重要决定因素。

在表 4 中，我们考察了解放浙江各县市的军队来源是否会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了“是否由来自山东根据地的野战军解放”和“是否由游击队解放”两个虚拟变量，其它的被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与前面的模型完全相同，分别估计了模型 1 至模型 4。如表 4 所示，这两个虚拟变量在 4 个模型中均不显著，这说明解放部队的来源对基层政权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不如“游击队武装力量的强弱”这一变量更为直接。

在表 5 中，我们将“游击队武装力量的强弱”和“解放部队的来源”这两个变量进行交互，生成了另外两个虚拟变量，即“游击队武装强并有游击队独立解放”，以及“游击队武装弱并且由来自山东的野战军解放”两个变量。这两个新生成的变量在模型 1 至模型 4 中仍然不显著，这说明了一个县由哪支部队解放并不重要，最为重要的因素仍然是地方革命历史传统的差异。当然，上述结论与 Liu（1992）的观点有所不同。

表 3: OLS 回归分析结果 1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1978-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指数增长率 (%)	1952-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指数增长率 (%)	1998年人均非国有 经济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1998年人均非国有 以及非外商投资工 业总产值 (元, 对数)
<b>解释变量</b>				
游击队强度 (1=强, 0=弱)	2.400** (2.11)	1.395*** (3.15)	0.551*** (2.95)	0.559*** (2.95)
<b>控制变量</b>				
<b>初始社会经济指标</b>				
7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2.476** (-2.46)			
52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2.742*** (-5.41)	-0.136 (-0.64)	-0.136 (-0.64)
52年人口规模 (万人, 对数)	3.063*** (3.15)	1.034** (2.48)	0.479*** (2.77)	0.479*** (2.73)
明清进士数 (人, 对数)	0.037 (0.05)	0.128 (0.40)	0.063 (0.45)	0.063 (0.45)
52年人均耕地面积 (公顷/万人, 对数)	1.853 (1.22)	1.651** (2.41)	0.638** (2.18)	0.659** (2.23)
<b>地理因素</b>				
海岸线长度 (千米, 对数)	0.214 (0.82)	0.114 (0.94)	0.0514 (1.01)	0.0495 (0.95)
平均海拔	-0.600	-0.499	-0.197	-0.202

(米, 对数)	(-0.42)	(-0.89)	(-0.83)	(-0.84)
15度以下平地面积比例 (%)	0.006 (0.09)	-0.002 (-0.09)	0.000 (-0.01)	0.000 (-0.01)
到上海的距离 (千米, 对数)	-1.484 (-0.59)	-1.268 (-1.20)	-0.501 (-1.09)	-0.415 (-0.89)
<b>F统计量</b>	10.26	9.31	14.57	13.00
<b>R<sup>2</sup></b>	0.48	0.59	0.60	0.57
<b>观测值个数</b>	58	58	58	58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t 统计量；\*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表 4：OLS 回归分析结果 2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1978-1998年人均 工业总产值指数 增长率 (%)	1952-1998年人均 工业总产值指数 增长率 (%)	1998年人均非国有 经济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1998年人均非国有 以及非外商投资工 业总产值(元, 对数)
<b>解释变量</b>				
游击队强度 (1=强, 0=弱)	2.376** (2.08)	1.445*** (3.46)	0.573*** (3.25)	0.575*** (3.20)
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0.229 (0.18)	-0.302 (-0.52)	-0.127 (-0.52)	-0.100 (-0.40)
来自山东的野战军解 放 (1=是, 0=不是)	-0.365 (-0.33)	-0.091 (-0.18)	-0.049 (-0.23)	-0.033 (-0.15)
<b>控制变量</b>				
<b>初始社会经济指标</b>				
7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2.379** (-2.33)			
52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2.738*** (-5.28)	-0.134 (-0.61)	-0.134 (-0.62)
52年人口规模 (万人, 对数)	2.789** (2.08)	1.121* (1.95)	0.510** (2.10)	0.507** (2.05)

明清进士数 (人, 对数)	0.072 (0.10)	0.103 (0.31)	0.053 (0.37)	0.055 (0.38)
52年人均耕地面积 (公顷/万人, 对数)	1.803 (1.18)	1.622** (2.30)	0.625** (2.07)	0.649** (2.12)
<b>地理因素</b>				
海岸线长度 (千米, 对数)	0.220 (0.81)	0.105 (0.85)	0.048 (0.92)	0.047 (0.88)
平均海拔 (米, 对数)	-0.412 (-0.30)	-0.542 (-0.93)	-0.212 (-0.86)	-0.215 (-0.86)
15度以下平地面积比例 (%)	0.019 (0.26)	-0.005 (-0.15)	0.000 (-0.06)	0.000 (-0.06)
到上海的距离 (千米, 对数)	-1.462 (-0.59)	-1.195 (-1.12)	-0.469 (-1.01)	-0.390 (-0.83)
<b>F统计量</b>	8.70	8.28	14.41	12.41
<b>R<sup>2</sup></b>	0.48	0.59	0.60	0.58
<b>观测值个数</b>	58	58	58	58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t 统计量； \*表示在 10%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 水平上显著。

表 5: OLS 回归分析结果 3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1978-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 (%)	1952-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 (%)	1998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1998年人均非国有以及非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b>解释变量</b>				
游击队强, 且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1.360 (0.91)	0.240 (0.33)	0.105 (0.33)	0.121 (0.38)
游击队弱, 且野战军解放 (1=是, 0=不是)	-1.074 (-0.96)	-0.470 (-0.91)	-0.165 (-0.79)	-0.160 (-0.74)
<b>控制变量</b>				
<b>初始社会经济指标</b>				
7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1.935** (-2.17)			
52年人均工业总产值		-2.640***	-0.096	-0.096

(元, 对数)		(-4.53)	(-0.40)	(-0.40)
52年人口规模	2.895**	1.204**	0.546**	0.542**
(万人, 对数)	(2.23)	(2.07)	(2.26)	(2.20)
明清进士数	0.0124	0.054	0.034	0.035
(人, 对数)	(0.02)	(0.16)	(0.23)	(0.24)
52年人均耕地面积	0.873	0.960	0.358	0.373
(公顷/万人, 对数)	(0.57)	(1.18)	(1.06)	(1.10)
<b>地理因素</b>				
海岸线长度	0.291	0.163	0.0716	0.0703
(千米, 对数)	(1.08)	(1.37)	(1.43)	(1.38)
平均海拔	0.538	0.0672	0.0321	0.0356
(米, 对数)	(0.41)	(0.11)	(0.12)	(0.13)
15度以下平地面积比例	0.043	0.010	0.005	0.005
(%)	(0.64)	(0.33)	(0.39)	(0.41)
到上海的距离	-2.335	-1.887	-0.759	-0.684
(千米, 对数)	(-0.90)	(-1.59)	(-1.49)	(-1.32)
<b>F统计量</b>	9.96	7.43	13.76	11.91
<b>R<sup>2</sup></b>	0.46	0.54	0.56	0.53
<b>观测值个数</b>	58	58	58	58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t 统计量；\*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

## 6. 结语

本文从中国地方政治的非正式权力结构入手，对于浙江解放后各县市的经济政策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进行了理论解释。研究发现，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路径影响了解放后政治精英之间的非正式政治关系，以及地方政权中的非正式权力结构。而在不同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地方干部的行为倾向和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分析视角也可以解释中国其它省份内部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例如，河北省的唐山（冀东游击队的根据地）、山东的临沂（山东纵队的根据地）、福建的泉州（闽中游击队的根据地）、广东的东莞（东江纵队的根据地）。这些相对于本省其它县市经济发展非常成功的地区，在解放后的历史上都存在本地干部与省委强势干部之间的权力冲突。

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前形成的保护群众的经济政策在改革后得到了强化，这不仅对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促进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发育。我们在温州等地区的访谈表明，当地的基层干部自 80 年代以来对于各种行业协会、文化社团、宗族宗教活动均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这进一步使得各种社会团体在地方公共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对基层社会的公共工程建设和稳定和谐带来了积极的作用。<sup>93</sup> 这表明，本文所

<sup>93</sup> 徐志刚等（2009）和刘明兴等（2010）的抽样调查发现，大量的能够独立决策的农村社团不仅有助于乡

强调的非正式政治权力结构在理解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方面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当然，对于该问题的讨论，还有待于更为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薄一波，1991，《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常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常山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长兴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2，《长兴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陈益元，2006，《革命与乡村：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慈溪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2，《慈溪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德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2，《德清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杜润生，2005，《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
- 奉化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4，《奉化市志》，北京：中华书局。
- 弗里曼（Edward Friedman）、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赛尔登（Mark Selden）著，陶鹤山译，2002，《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海宁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5，《海宁市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湖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9，《湖州市志》，北京：昆仑出版社。
- 黄琨，2006，《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黄荣华，2006，《革命与乡村：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黄宗智，198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
- 黄宗智，2000，《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 黄孟复主编，2006，《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3（2005~200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嘉善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5，《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 江山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江山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金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2，《金华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开化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88，《开化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刘明兴、刘永东、陶郁、陶然，2010，“中国农村社团的发育、纠纷调解与群体性上访”，《社会学研究》，第六期。
- 龙游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1，《龙游县志》，北京：中华书局。
- 卢晖临，2008，“革命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学年鉴（2003~2006）》，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编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卢晖临，2003，《革命前后的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一辑，北京：商务印书馆。
- 宁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宁海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 平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2，《平湖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村公共建设，而且有助于化解干群矛盾，减少群体性上访的发生。

衢县志编纂委员会编，2002，《衢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衢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志编辑部编，1995，《衢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志》，内部印行。

衢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4，《衢州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平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平阳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浦江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浦江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丘海雄、徐建牛，2004，“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研究述评”，《社会学研究》，第4期。

瑞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2003，《瑞安市志》，北京：中华书局。

瑞安五十年编辑委员会编，《瑞安五十年（1949—1999）》，内部资料。

山东省档案局编著，2005，《山东南下干部》，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史晋川，2005，“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浙江模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第5期。

史晋川、金祥荣等，2004，《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修订版。

史晋川、汪炜、钱滔，2004，《民营经济与制度创新：台州现象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王友明，2006，《革命与乡村：解放区土地改革研究：1941—1948》，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

武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武义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萧山县委，1957，“中共萧山县委关于农业社少数社员闹退社的情况报告”，内部文件，7月3日。

萧山县志编纂委员会，1987，《萧山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徐志刚、刘明兴、刘永东，2009，“农民组织对村庄公共融资的影响：掣肘还是助推？”，《经济学季刊》，第三期。

叶扬兵，2003，“1956—1957年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第6期，第51—59页。

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87，《义乌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乐清县志编纂委员会编，2000，《乐清县志》，北京：中华书局。

伊心恬，1957，“巩固合作化事业、抛弃资本主义道路—温州专区纠正“包产到户”的错误，农业社重新实行统一经营、集体劳动”，《人民日报》，10月13日。

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03，《永嘉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永嘉县农业局编，1997，《永嘉县农业志》，北京：海洋出版社。

余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3，《余姚市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共永嘉县委党史研究室、永嘉县农业局、永嘉县档案馆合编，1994，《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浙江省永嘉县包产到户的实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编，1989，《浙江解放》，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编，1994，《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组织史资料（1922.4—1987.12）》，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1981，《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浙江省市场志编辑部编，2000，《浙江省市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

- 浙江省统计局编, 1999, 《浙江统计年鉴 1999》,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浙江省统计局编, 2000, 《新浙江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 浙江省鄞县地方志编委会编, 1996, 《鄞县志》, 北京: 中华书局。
-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编纂委员会编, 2007, 《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 朱保炯、谢沛霖编, 1980, 《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全三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朱健, 2006, “承继革命传统、着力自主创新—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 85 年历程”, 《浙江档案》, 第 6 期, 第 26—29 页。
- Acemoglu, Daron. 2003,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 pp. 620-652.
- Acemoglu, Daron. 2006, “A Simple Model of Inefficient Institution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4), pp. 515-546.
- Bueno de Mesquita, Bruce, Alastair Smith, Randolph M. Siverson, and James D. Morrow. 2003, *The Logic of Political Survival*,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Campos, Jose Edgardo & Esfahani, Hadi Salehi. 1996, "Why and When Do Governments Initiate Public Enterprise Reform?,"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ol. 10(3), pages 451-85, September.
- Che, Jiahua and Yingyi Qian. 1998, “Insecure Property Rights and Government Ownership of Firm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May 1998b, 113(2), pp. 467-496.
- Foster, Keith, "Localism, Central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Purges of 1957-1958: the Case of Zhejiang,"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E. Sharpe Inc, 1997).
- Kellee Tsai. 2006, "Adaptive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d Endogenou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59 (October): 116-141.
- Kung, James and Lin Justin Yifu. 2003, “The Causes of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 1959—1961.”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 52, October, 51- 73.
- Li, David (1994). “Ambiguous Property Right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 1-19.
- Liu, Yia-Ling. 1992,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Local Politics in the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of Wenzhou,”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30, (June), pp. 293-316.
- Nee, Victor. 2000,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Making a Market Economy.”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156 (2000): 64-88.
- O’Brien, Kevin J and Lianjiang Li, 1999, “Sel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Rural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no.2(January), pp. 167-186.
- Olsen, Mancur. 1993, “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no.3, pp.567-576.
- Oi Jean C. 1992,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Vol. 45, No. 1 (October), pp. 99-126.
- Oi Jean C. 1995, “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December) No. 144, pp. 1132-1150.
- Oi Jean C. 2005, “Patterns of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China: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Privatization,” *China Journal* (January), pp. 115-136.
- Peng, Yusheng. 2001, "Chinese Villages and Townships as Industrial Corporations: Ownership,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sciplin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5).



- Putterman, Louis. 1997, "O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China's township and village-owned enterprises." *World Development*, Vol. 25(10): 1639-1655.
- Qian, Yingyi and Chenggang Xu. 1993,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 Differ: The M-form Hierarchy and Entry/Expansion of the Non-state Sector."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vol1,no2,(June), pp. 135-170.
- Qian, Yingyi and Gérard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8,no5,pp 1143-1162.
- Ravi Ramaurti. 1999, "Why Haven't Developing Countries Privatized Deeper and Faster?," *World Development*, Vol . 27, No. 1.
- Weitzman, Martin and Chenggang Xu. 1994, "Chinese Township Village Enterprises as Vaguely Defined Cooperative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8: 121-145.
- Shih, Victor, *Factions and Finance in China: Elite Conflict and Inf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附录:

在附录的回归结果中，我们采取另外两种对游击队武装强度的测度方法。

1、是否从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1944 年至 1948 年间）存在持续的革命武装力量（1=是，0=不是）。这个方法使得被确认为“有游击队武装”的样本县的数量下降；

2、区分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和一般的游击队力量，分别构造了“是否建立主力游击队（1=是，0=其它）”和“是否建立非主力游击队（1=是，0=其它）”两个虚拟变量。这里，浙东地区游击队的主力部队是金萧游击第一支队和四明山人民爱国自卫总队，浙南地区游击队的主力部队是括苍支队和浙江壮丁抗暴自救军第三总队，我们把这四支主力游击队活动的县市视为存在“主力游击队地区”，而其余的在杭州解放前一年建立过游击队的县市视为存在“非主力游击队地区”。

从回归结果之中可以看出，使用不同的测度方式，并不影响我们的研究结论。当然，一个更好的测度地方武装力量的变量是“游击队或者武工队的人数或枪支数量”，但是我们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里难以得到这方面的详尽历史信息。

表 6 OLS 回归分析结果 4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1978-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 (%)	1952-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 (%)	1998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1998年人均非国有以及非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 (元, 对数)
<b>解释变量</b>				
<b>第一组回归</b>				
游击队强度 (1=强, 0=弱)	2.434** (2.11)	1.396*** (3.20)	0.598*** (3.29)	0.617*** (3.38)

第二组回归				
游击队强度 (1=强, 0=弱)	2.437** (2.03)	1.456*** (3.30)	0.625*** (3.41)	0.640*** (3.46)
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0.109 (0.09)	-0.359 (-0.65)	-0.160 (-0.69)	-0.136 (-0.57)
来自山东的野战军解放 (1=是, 0=不是)	-0.425 (-0.40)	-0.122 (-0.25)	-0.0685 (-0.33)	-0.0539 (-0.25)
第三组回归				
游击队强, 且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1.354 (0.92)	0.341 (0.48)	0.147 (0.48)	0.161 (0.52)
游击队弱, 且野战军解放 (1=是, 0=不是)	-1.356 (-1.24)	-0.464 (-0.91)	-0.217 (-0.99)	-0.216 (-0.97)
观测值个数	58	58	58	58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t 统计量；\*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本表中的回归分析控制了初始的社会经济指标以及地理变量，但省略了相关统计量的报告。

表 6 OLS 回归分析结果 5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1978-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	1952-1998年人均工业总产值指数增长率(%)	1998年人均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元, 对数)	1998年人均非国有以及非外商投资工业总产值(元, 对数)
解释变量				
第一组回归				
主力游击队 (1=是, 0=不是)	3.379** (2.62)	1.872*** (3.52)	0.763*** (3.43)	0.768*** (3.36)
非主力游击队 (1=是, 0=不是)	1.828 (1.47)	1.103** (2.20)	0.421* (1.99)	0.430** (2.02)
第二组回归				
主力游击队 (1=是, 0=不是)	3.348** (2.60)	1.937*** (3.65)	0.791*** (3.55)	0.791*** (3.43)
非主力游击队	1.837	1.147**	0.441**	0.445**

(1=是, 0=不是)	(1.45)	(2.39)	(2.18)	(2.17)
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0.117 (0.09)	-0.343 (-0.58)	-0.145 (-0.58)	-0.118 (-0.46)
来自山东野战军解放 (1=是, 0=不是)	-0.296 (-0.26)	-0.0568 (-0.11)	-0.0344 (-0.16)	-0.0182 (-0.08)
<b>第三组回归</b>				
主力游击队, 且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3.031** (2.07)	1.037 (1.53)	0.438 (1.53)	0.463 (1.58)
非主力游击队, 且游击队解放 (1=是, 0=不是)	0.124 (0.07)	-0.327 (-0.35)	-0.133 (-0.34)	-0.123 (-0.31)
无游击队, 且野战军解放 (1=是, 0=不是)	-1.151 (-1.03)	-0.516 (-1.01)	-0.184 (-0.89)	-0.180 (-0.85)
<b>观测值个数</b>	<b>58</b>	<b>58</b>	<b>58</b>	<b>58</b>

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的 t 统计量； \*表示在 10%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5%水平上显著； \*\*\*表示在 1%水平上显著。本表中的回归分析控制了初始的社会经济指标以及地理变量，但省略了相关统计量的报告。